



列宁论
社会主义所有制

列 宁 論
社會主義所有制

法 律 出 版 社

1960年·北京

2374

ЛЕНИН
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8年

本書根据苏联国家政治音像出版局莫斯科 1958 年版譯出
書文除出版者的話外，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寧全集

列寧論社会主义所有制
苏联国家政治音像出版局編

法律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区十二条九号）
北京市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北京新华印制厂印刷

*

850×1168 纸 $\frac{1}{32}$ · 9 $\frac{9}{10}$ 印张 · 211,000 字

1959年12月第一版

1960年3月北京第三次印行

印数：53,001—83,000 定价：(7)1.00元
毛 价：5004·305

出版者的話

弗·伊·列寧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性和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學說，指出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化的具體道路，科學地分析了關於社會主義所有制兩種形式及其發展前途的問題。

弗·伊·列寧曾經指出，雖然“社會主義必然到來的主要物質基礎”（見本書第30頁）是由資本積聚和集中所造成 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內部不能產生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任何因素。社會主義所有制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過程中，通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消滅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才能產生和確立。

弗·伊·列寧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草案及其說明”中寫道：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只有當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整個社會掌握了全部土地、工具、工廠、機器、矿山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時，才能結束。到那時候，即在社會主義生產制度下，工人生產的一切和一切生產革新都應該有利於勞動者本身”（見本書第7頁）。

弗·伊·列寧根據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的不同，曾經指出，生產資料公有化和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形成是通過各種不同的道路產生的。由於剝奪屬於資本家和地主所有的生產資料，才能把大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而解決小私

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問題应当是另一回事。弗·伊·列寧在其許多著作中：“論合作制”、“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政論家札記”、論“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論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全国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上关于土地問題的报告中，在全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問題的演說中，曾經指出，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是合作化，并通过自願联合为大的集体經濟的办法，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設，是建立公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第二条主要道路。

由于生产資料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方法的不同，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产生并发展成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反映着处在紧密联盟中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不同。

弗·伊·列寧向來就沒有把上述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对立起来，并且指出这两种形式的本質是同一类型的。

弗·伊·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拟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天才計劃，列寧提出了在一切大生产資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和保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合作社是社会主义企业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論原則。弗·伊·列寧曾宣称，合作事业的增大等于社会主义的增大。“而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見本書第275頁）。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它們只能依生产公有化的程度加以区别。但是，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的本質是同一类型的，也就是说，这两种形式

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

弗·伊·列寧曾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程中利用其他方法的可能性，特別是，列寧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为了有利于建設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国家資本主义所有制（參看1918年4月29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員會會議上“关于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产阶级性”、“論革命空談”、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等）。大家知道，在苏联，由于当时历史情况的特点，国家資本主义沒有得到广泛的利用。而在中国，又在另一种条件下，国家資本主义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以便把資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

弗·伊·列寧曾指出，国家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國民經濟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应起主导作用。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質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見本書第255頁）。

此外，在本書所發表的这些作品里，还闡明了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础的建立、國民經濟的管理和計劃化的組織、社会产品的分配、国家財政的組織、貨币流通等等問題。

本書所采用的某些文章有些是全文，有些是摘录。这些材料是按年代順序編排的。所有这些著作完全按照“列寧全集”第4版原文刊印。本書最后注釋部分是按照这一版的參考資料編排的。

紅光譯

目 录

出版者的话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
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及其說明.....	6
我們党的綱領草案.....	8
危机的教訓	1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綱領草案	15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綱領	18
給农村貧民	20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綱領	24
卡尔·馬克思	30
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	34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35
根本問題之一 (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会主义者是怎样驟論的).....	3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會議 (四月代表會議) (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	40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4月24日(5月7日)).....	40
13. 关于土地問題的报告 (4月28日(5月11日)).....	43
15. 关于土地問題的決議	48
21. 为捍卫关于目前形势的決議而發表的演說 (4月29日(5月12日))	51

22. 关于目前形势的決議	54
給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	58
論“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論據）	60
修改党綱的材料	64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年5月4—28日[5月 17日—6月10日])	71
1. 土地問題的決議草案	71
2. 关于土地問題的講話(1917年5月22日[6月4日])	73
論立宪幻想	85
政論家札記	87
大難船头，出路何在	90
国家与革命	103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	103
革命的任务	111
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	113
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17年10月) 25—26日[11月7—8日])	117
4. 关于土地問題的報告(10月26日[11月8日])	117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	122
答复农民的問題	123
告人民書	125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关于銀行国有化問 題的发言(1917年12月14日[27日])記錄	127
关于实行銀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130
怎样組織竞赛?	133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135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	138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月11日[24日])	138
3. 代表大会闭幕词 (1月18日[31日])	141
海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 (1918年1月18日[31日])	145
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员的讲话 会议报道	146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 (1918年3月6—8日)	151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 (3月8日晚上)	151
18. 党纲草案草稿	154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 速记记录	161
在阿列克谢也夫练习马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4月7日) 大会报道	163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165
经济政策和银行政策的要点	181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183
给国有化企业代表会议的信 (1918年5月18日)	191
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5月26日)	192
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 (1918年11月8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202
在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12月11日)	
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	207
(1919年3月13日)	217
俄共(布)党纲草案	221

1. 俄共党綱草案草稿	221
2. 俄共（布尔什維克）党綱草案	232
伟大的創举	233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	237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員會的報告” (1920年3月29日)	243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綱	246
青年团的任务 (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248
国际劳动妇女节	251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2日—7月 12日)	254
关于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草案初稿)	254
关于俄共的策略的報告 (7月5日)	256
十月革命四周年	258
論法国共产党的土地問題提綱	260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會議代表团 的報告的決議草案	262
給德·伊·庫爾斯基的信 (1922年5月17日)	264
答“曼彻斯特卫报”記者阿·兰索姆提出的問題	265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267
論合作制	271
給阿尔都尔·施米特	279
給德·伊·庫爾斯基的便条	281
注 譯	28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

第一次全国代表會議文件

(一)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決議

一、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新形势，更好地担负起技术革命新时期的重大任务，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科联）、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科普）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同意科联全国委员会和科普全国委员会的联合建議，批准科联、科普两个团体合併，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

二、中国科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群众团体，是党动员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和助手。

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結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它的具体任务是：(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創造和先进經驗；(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識；(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材；(5)經常开展学术討論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繼續进行知識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6)加強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三、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創造或在技术革新方面有成就的、或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的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不拘学历，都可以自愿申請，經所在地区或单位的科协基层組織批准，成为科协的會員。

四、中国科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举全国委员若干人組成全国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閉会期間領導科协的工作。

全国委员会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及主席团委员若干人組成主席团，并选举书记若干人組成书记处，在全国委员会休会期間，书记处在主席团的领导下，負責處理中国科协的日常业务。

五、各省（市、自治区）及各专区、市、县得成立科协的地方組織，定名为××省（市、自治区）或××专区、市、县科学技术协会。科协各级地方組織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和上級科协的业务指导。

科协各级地方组织都可以召开代表大会选举自己的领导机构。

六、在群众需要的情况下，科协应该在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机关等单位建立科协基层组织。定名为××单位科学技术协会。科协基层组织受所在单位党委的领导和科协上级组织的业务指导。

七、在中国科协成立后，原科联、科普各级组织应按以下原则进行合併：

(一) 原科联各学会会员和科普会员，一律转为科协的会员。凡科协的会员都可以根据本人的特长、爱好和生产业务的需要参加一个或几个学会的活动。

(二) 原科联各学会和原科普各学组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整顿，成为科协领导下的学会，进行经常的专业活动，同时担负普及与提高的任务。

(三) 各学会受当地科协和政府有关业务部门的直接领导和上级学会的业务指导。

各省(市、自治区)科协参照上述原则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决定合併的具体办法。

八、中国科协各级组织在执行各项任务中，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认真贯彻中央与地方并举、土洋并举、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科协各级组织必须注意充分发扬科学技术群众组织的特点，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并在各项运动中，和一切脱离党的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迷信外国、迷信权威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不断的斗争，使我国科学事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跃进。

1958年9月23日

(二) 关于响应党中央号召为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 科学技术规划而斗争的决议

董荣臻副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提出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在1962年完成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庄严号召，全体代表一致热烈拥护，并愿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贡献出一切力量。

大会要求科协各级组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并积极协助各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具体措施，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争取在1962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并争取各地方科学规划的提前实现；为建成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祖国，更早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1958年9月25日

(三)关于开展建国十周年科学技术献礼运动和准备召开 全国科学技术发明創造积极分子代表會議的決議

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羣众，鼓足干劲，在全国各地掀起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技术革命羣众运动，大会決議：

一、开展建国十周年科学技术献礼运动。大会号召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紧密围绕当前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等中心任务和国防建設的要求，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創造方面作出貢獻，以促进生产大跃进和科学技术的大跃进。在今年内特别应当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号召而奋斗。献礼运动的具体办法另定。

二、为了集中反映羣众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的科学技术成果、交流发明創造的經驗、表扬技术革命运动中的先进人物，大会决定1959年9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发明創造积极分子代表會議，要求科协各級組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协同有关方面充分发动羣众，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召开會議的具体办法另定。

1958年9月25日

批判曾昭安先生在数学史研究領域 內的唯心主义学术观点

杜石然

一九五八年十月号的“数学通訊”，以全部篇幅大力地揭发和批判了曾昭安先生在主编“数学通訊”工作中以及在教学工作和教学思想方面的許多錯誤观点。多年以来，曾昭安先生就以数学史专家自命，解放以后更在他自己主编的“数学通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数学史方面的文章，并在一九五六年把他所編写的“中外数学史”（第一篇，两巨册，共 571 頁），作为武汉大学的讲义印了出来，所有这一切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頗为广泛的影响。尽管曾昭安先生曾多方努力，并一再表明：希望能够用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叙述数学史，但由上述著作看来，这种希望还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实际上，这些著作所闡述的观点和馬列主义的观点不但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背道而馳的。

有的同志認為，曾昭安先生的一些著作是东抄西拼、謬論連篇，根本不值一駁。这种看法的前一半当然是对的。曾昭安先生的著作确实是东抄西拼、謬論連篇的。但是是否就不值一駁了呢？我們認為不能得出这样的結論。曾昭安对数学的产生和数学发展規律的看法，对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直到对研究数学史的社会目的性等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上都有着他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包含有极其严重的錯誤。实际上，这些观点正是資产阶级学术观点在科学史研究領域内的具体反映。在这一方面，曾昭安先生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代表性的。

对科学史研究領域内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的討論和对科学史研究領域內的資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不論在任何时候都是應該进行，同时也是必須进行的。马克思始終認為：“如果我們貢獻給劳动者的东西有一点不够尽善尽美的話，那就算是一种罪恶！”¹⁾

我們愿意对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表示我們的态度，希望引起爭論，从而把科学史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因为篇幅有限，我們不能把曾昭安先生所有著作中的一切大小問題全部都涉及到。更具体地说，我們也不想用史料来打史料。因为如果要那样作，我們就勢必要跟随着曾昭安先生从地球的生成开始（象他在“中外数学史”中所作的那样），而且很容易会轉入

1) 恩格斯：給史密特的信，載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論的信，艾里奇譯，中國人民大學，第10 頁。

史料考證方面的爭論。在这里，我們只想涉及为数不多的几个問題，但是我們認為这些問題都是重大的和带有最根本性質的。

下面就是这些問題。

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曾昭安先生的数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厚古薄今”的。我們認為：作为文化史一部分的数学史，它應該和整个的历史科学一样，要正确地来闡述数学发展的規律，并用这一規律来武装劳动人民，从而推进祖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此目的，我們就不能不密切注意开展現代或近代数学史的研究工作。但是我們并不反对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也并不反对古代数学史料的考据，有价值的研究和考据永远都是值得人們重視的。問題是在于曾昭安先生对待“古”“今”的看法，对待史料的态度都是錯誤的。下面我們將陸續談到这一点。曾昭安先生在講到中国数学史，他經常在“春秋战国”繞圈子，講到世界数学史則又总是离不开“希腊羅馬”的范围。人們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經常看到如下的一段“妙”論。他說道：“‘黃金分割’和‘商高定理’可称为数学中的双宝，一个好象金珠，一个好象玉璧，这两件寶貝裝飾在‘数学愛人’的身上，不更显得光耀眩目玲瓏可愛嗎？”把数学称为愛人，并在她身上装滿金珠玉璧，这当然是庸俗不堪的資产阶级人生觀的流露，但与此同时人們也不难从中看出曾昭安先生对待古代科学遗产所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和古玩商人欣賞古董的态度是很相近似的：愈古愈是宝，愈是宝就愈值錢。曾昭安先生之所謂“宝”，总都是些两千多年以前的东西。他所著的“中外数学史”，因只出版了第一編，未見全貌，不敢妄論；但在其所著“数学发展史”（曾于“数学通訊”第一卷上分期連載）中，人們可以看到：对近代数学史除了零星的資料之外，根本談不上什么比較認真的討論。

当然，“厚今薄古”并不能理解为“只今无古”，否則就会割断历史，否認历史发展的繼承性。我們并不反对古代史的研究，問題是在于研究古代史的社会目的性。郭沫若院长講的很好：“我們为什么要搞古代史或研究古文物？目的是在闡明历史发展規律，让人们掌握这个規律，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現在或將來的建設服務。我們并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更不是为崇古而考古”¹⁾，也就是說，古代史的研究必須联系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需要，必須要“古为今用”。

曾昭安先生对联系实际的理解則是非常庸俗和非常牽強的。在“中外数学史”中，他曾提出过“幻方”有什么实际用处之类的問題。他說：“例如有九个物体，……摆成幻方，那么放在平板上，或水面上，就能平衡；若令在水面上推动，也比较稳当而且安全。”

1) 見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報。

他还曾提出过“‘九九’可以作哪些用途”的問題，但却在“九九消寒图”上大作文章，“涂花描字”之类的消寒图和苏轼的詩一道，作为联系实际的資料，抄进了数学史。在談到“数学的实在性”时，他曾举例說：“例如树上有鳥四只，用鎗击中一只，还剩几只？就應該答树上沒有鳥。又如問缸內魚五尾，死去二尾还有几尾？[就應該說缸內仍有五魚]”。总之，在曾昭安先生看来，联系实际不外乎是打鳥、养魚、涂花描字，或是有如“‘幻方’有什么实际用处”之类的主观臆想出来的“实际”。武汉大学的一些同志已經揭露 出曾昭安先生在主編“数学通訊”工作中的一种“数学遊戲”式的庸俗化傾向，上述問題，也可以看作是庸俗化傾向在联系实际問題上的反映。

既然研究古代史并不是为了闡明历史发展的規律，也不是为現在和将来服务，那么也就不需要什么史的敍述，剩下来的只有是史料了。用史料来代替历史，这正是“厚古薄今”的一个具体表現。曾昭安先生的著作，从某一方面講來，恰好就是專門記載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发明或发现某件事物的历史事件的記錄簿。在“中外数学史”中所提出的許多“問題”也都是什么“印度人談几何学，最早在什么书中可以看到？”“西洋最古的数学书名字叫作什么？”……。

我們反对以史料来代替史学，反对以历史事件的記錄簿来代替历史，这并不是說任何史料都不再需要。恰恰相反，史料是應該受到人們重視的。因为一部沒有史料的历史著作是不能想象的，史料不足的也算不得是什么好著作。特別是那些有价值的資料工作，则更是值得人們珍視的。

但是必須指出，在曾昭安先生的著作中，如在“中外数学史”中，则是大量地抄入了許多与数学史毫无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所謂”。

从“地球的年代”开始，包括占全书1/7以上篇幅的“度量衡的变迁”；花費了30多頁的篇幅大談其“商高定理的証法”，其中包括从所謂“獅子踞座”到“新娘花轎”等各种圖式；占80多頁篇幅的“商高數表”；占1/7以上篇幅的“大數紀法”、“小數紀法”……。在书中，曾昭安先生还不仅抄入了“惠施历物十事”、“公孙龙理論五篇”等“堅白”、“卵有毛”之类的詭辯派的謬論，反而大加發揮。最沒有道理的是把“磁石吸鐵”、“雪花六出”等等都作为“我国天算学”的成就抄了进去。据不十分精确的統計，这类“史料”在书中至少有350頁以上，占全书60%強。人們不仅要問：一方面曾昭安先生“厚古薄今”，另一方面却又在书中抄入了各种样式这一类的“史料”，其用心究竟何在呢？曾昭安先生是否想通过它，把广大的青年羣众也都領到一家收卖废銅烂鐵的古董店里去呢？

当然，曾昭安先生的用心也許还远不止于此，在下文中适当的地方我們还要談到这些“史料”。

1) 195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二

其次，我們必須指出：曾昭安先生对数学的产生和发展，对数学发展規律的理解也是极端荒謬的。

数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在人們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数学是从人們的实际需要上产生的：是从丈量地段面积和衡量器物容积，从計算時間，从制造工作中产生的。”¹⁾（重点系原书中所加）。

曾昭安先生則与此相反，他却宣揚数学是“精神的产物”，認為 1,2,3,……,9,0“这种发明，在古时代是由許多学者耗費了不少的心血，經過几千年之后才想出来的。”怎么会是想出来的呢？难道数目真的是从純粹的思維中产生的嗎？恩格斯早已指出：不論是形的概念，或是数的概念都完全是“从外面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从純粹的思維中产生的”，“不是从任何地方得来，而仅仅是从現實世界中得来的。人們用十个指头算数目，就是說作第一次的算术运算，这十个指头可以是一切別的东西，但总不是理性的自由創造物。”²⁾

正因为曾昭安先生臥为数学是“精神的产物”，是“許多学者耗費不少心血……想出来的”，从而他也就臥为数学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和“奇妙的”（这类字眼在他的“中外数学史”中几乎是俯拾即是）。更进一步，他也就把数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臥为“数学是一切科学之母，数学是万能”，臥为“科学之进步，有賴于数学”……。从而他也就毫无批判地——实际上是讚賞地引用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宇宙觀”，“万物的根本是数”和“数是世界的开始”之类的觀点。同时他也同样毫无批判地引用了韓簡所說的“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并加以解释說“這話是表示事物的开始，就是算术的开始”。写到这里，我們不仅恍然大悟，原来曾昭安先生其所以要由“地球的形成”开始来写他的“中外数学史”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这恰好是上述“数是世界的开始”或是“物生而后有……数”之类觀点的反映。在我們看来，这是荒誕的生拉硬扯，违反了客觀事物的发展規律；而在他看来确是变成无可或缺的史的叙述了。

曾昭安先生还引用了許多神話和傳說，而絲毫未加以分析批判。例如在“几何学三大問題”的敍述中，就曾毫无批判地敍述了“神龜倍积”問題，并且煞有介事地写道：“……神龜改造为倍大，那个疫病就会消灭”，神龜作錯了“疫病并未終止，反更加重……后来神龜作成，疫癘也終止了”，这本来是一个傳說神話，神龜和疫癘会有什么联系？！而曾昭安先生却声明：他“不能断定它含有多少真实性”。关于“河图洛书”的神話也是

1)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頁。

2) 同上书，第37頁。